

# 生態主義的終結或轉型？ 評介貝克、盧曼與普魯東\*

陳世榮\*\* 鍾政儒、蘇俞銘、張翰中\*\*\*

## 綜合評述

N. Luhmann (J. John Bednarz, Trans.)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9, 200 pp., ISBN 0226496511)

U. Beck (A. Wisz, Trans.)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260 pp., ISBN 080398345X)

I. Blühdorn *Post-Ecologist Politics: Social Theory and the Abdication of the Ecologist Paradig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40 pp., ISBN 041519203X).

自然內涵正進行著激烈轉變，過去理想色彩濃厚的環保理念，例如「回歸自然」、「資源極限」，在今天仍舊被傳達與運用，但另一方面

---

\* 感謝匿名審查人的細心指正，惟文責仍由作者們自負。

\*\*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 鍾政儒等三位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更屬樂觀的、經濟導向的概念也不斷地被提出，例如「綠金時代」、「綠能科技」、「綠色企業」等。這樣的轉變顯示，當生態問題迫近眼前，從個人到國家，所思考的是現實的能源、產業、經濟、賦稅、科技等問題，環境道德訴求與社經根本調整似乎顯得遙遠與模糊，甚至相互之間也產生衝突。生態主義終結了嗎？現今的環境運動應如何定調？本文藉由對貝克、盧曼，以及以普魯東為代表之後生態主義的論著評介，鋪陳有關人類／自然、社會／環境、科技／生態關係的理論發展，爬梳當代知識界對於自然多重內涵的回應歷程與脈絡。

**關鍵詞：**生態主義、後生態主義、貝克、盧曼、普魯東

## 一、導 言

當環境議題逐漸獲得更多媒體披露與大眾認知，關懷自然逐漸從過去的街頭抗爭成爲日常消費的基本要求，我們可能會驚覺人們對於「自然」、「環境」、「生態」、「綠色」的理解已經有相當大的轉變，但是這樣的轉變卻又不是可以清楚區隔。過去，理想色彩濃厚的環保理念，例如「回歸自然」、「資源極限」仍舊被傳達與運用，但另一方面更屬樂觀的、經濟導向的概念不斷被提出，例如「綠金時代」、「綠能科技」、「綠色企業」等。尤其是隨著國際環境建制的擴張，環境管制轉化爲一系列的指標與時程，各國被迫思考因應的，是現實的能源、產業、經濟、賦稅、科技等問題，環境道德訴求與社經根本調整似乎顯得遙遠與模糊，甚至相互之間也產生衝突與矛盾。面對這樣的轉變，生態主義訴求應如何定調？環境運動的意義與實質又是什麼？傳統生態理

論，特別是深層生態主義與激進環保運動都無法提出令人滿意的詮釋，他們將自然視為不證自明的概念，既無法解釋多樣繁複的生態詮釋，在實踐上也無法抗拒當前主流、軟性、漸進、溫和的改革基調，更難以說明各個地方與社會為何對全球性環境議題有不同的理解與反應，傳統生態詮釋與主張可以說是面臨潰退與失效。本文透過當代三個重要生態論著的評介，亦即藉由對貝克（Ulrich Beck）、盧曼（Niklas Luhmann）以及普魯東（Ingolfur Blühdorn）等人論著之探討，<sup>(1)</sup>鋪陳有關人類／自然、社會／環境、科技／生態關係的理論發展，並提示出學界對於自然多重內涵的回應與脈絡。

環保運動與生態理論對自然之終極價值，雖始終捍衛不懈，卻沒有為當前生態思潮提供有力的理論基礎。反倒是早期法蘭克福學派，提供了「與自然和解」（reconciliation）才是人類未來出路的深刻剖析。按 M. Horkheimer 和 T. Adorno 的觀察，人類企圖透過對自然的控制與開發來追尋主體的解放，但卻在這一理性啓蒙的探索中迷失自己，在人所建構的「第二自然」中作繭自縛，真正主體復歸已不可能，如今也只有儘可能透過自我批判與自我重構，去追尋與自然的和解共生（Horkheimer & Adorno, 1972）。可惜，現代意義的生態問題並非法蘭克福學派所想要處理的主要對象，加之以它那過於抽象的陳述，對於環保實踐未能提供

---

<sup>(1)</sup> 評介的主要三本論著為Luhmann, N. (1989).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Jr. John Bednarz, Tran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 pp., ISBN 0226496511);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Mark Ritter, Trans.). London: Sage (260 pp., ISBN 080398345X); Blühdorn, I. (2000). *Post-ecologist politics: Social theory and the abdication of the ecologist paradig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40 pp., ISBN 041519203X).

有用的理論推力。貝克則走出人類／自然的哲學式批判，直觀客體環境與主體人類的互動；然而這種互動到了盧曼眼中，卻是一種錯覺與虛妄，環境問題其實是社會系統的意義建構；後生態主義則企圖延續這種環境建構論的立場，在倡議捐棄單一、崇高的「自然」概念後，企圖針砭不確定風險社會中生態政治所可能衍生的扭曲。

## 二、貝克的風險社會

儘管貝克晚期作品處理較為廣域的市民社會問題，但其主要觀點仍奠基於其早期的《風險社會》一書（1992），本文即由該書切入。當然這樣的回溯切入主因還在於，貝克的生態詮釋在當代社會／環境解析中佔有思潮轉折的重要位置。對於貝克而言，當前人類所身處的是一個風險社會，這是現代化追求無可迴避的副作用（Beck, 1992: 51）。在風險社會中，我們首先要處理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科技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這裡可以發現，貝克延續著法蘭克福學派的問題意識，亦即環境威脅歸諸於現代化過程。只不過，貝克將注意力完全轉移到環境與生態之上，使他在風險與現代化社會的研究議題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工業社會不同，風險社會不是被財富爭奪所支配的社會，而是被大型災難所支配的社會。其風險特徵是跨世代、跨國界，其影響深度與廣度不僅不容易掌握，甚至還超越人／自然的界線，以迄物種與星球（Beck, 1992: 21）。自然不再是主體的對立面，純粹自然已不復存在，生態威脅正是來自於人造的自然（Beck, 1992: 12），亦即社會化的自然。既然環境問題必須視為複雜的社會議題，社會／自然二元論就必須放棄，環境議題因此不能從尋求主體解放中獲得，而是必須承擔責任、面對風險，設法

扭轉那個伴隨現代化的生態危機。

貝克的風險社會概念成功的超越傳統生態主義觀點，但也同時透露其理論內在的不一致。就貝克看來，在當代風險社會中，物理環境的惡化是如此顯而易見，環境威脅所引發的逃避、求援、生存動機，可以引發普遍且立即的社會共識與行動 (Beck, 1992: 159; 1995: 47)，這一樂觀推論等於表明風險認知不需乞靈於自然的烏托邦，更擺脫了早期批判理論對於「與自然和解」前景的消極看法。依他的詮釋，現代化造就物理環境的崩解，也同時改變人們有關自然的文化信仰與假設，因此可以感受到風險的存在。隨著人們對於自然認知的改觀，或是說，當人們認識到這個社會化自然已經滿目瘡痍 (Beck, 1992: 81, 115)，社會開始走向「第二現代化」，「一個反思的現代化」，科技作為現代化基礎，也是風險的始作俑者，自此受到文化轉型影響有了分殊與自我批判，科學的合理性也因此被科學自身所質疑 (Beck, 1992: 156, 161-162)。一個類後現代的、多元的、競合的生態解讀於焉形成，亦即，社會的文化規範決定怎樣的風險是可以容忍或不可以容忍 (Beck, 1995: 45-48)。但是，風險既然是多元定義的結果，風險社會所參照的客觀生態災難便無從確立，這使得貝克的理論陷入衝突。貝克並不認為需要去處理這個問題，誠如前述，他認為物理環境的惡化是顯而易見的，其效應是真切的 (Beck, 1992: 45)，普遍的 (Beck, 1992: 31)。結果，他一方面強調文化價值差異影響環境意識，但一方面又認為風險客觀性將超越個人處境，產生平等效應 (Beck, 1992: 36)。此一理論的內部緊張，使貝克風險社會概念有著目的論式的天啓說教意味，終究使貝克無法擺脫對環境倫理的潛在依賴。



### 三、盧曼的生態溝通

盧曼以其系統理論受到當代學界重視，其主要思維奠基在其一九八四年德文出版的《系統理論》一書（1995），而《生態溝通》一書（1989）則是他運用其系統理論解構傳統生態論述的一種呈現，雖然該書宗旨並不在具體探討特定生態議題，但也反映了他對於生態議題的基本觀察，本文以《生態溝通》一書為主要評介對象。

按盧曼的觀點，社會對於生態意義的掌握，並非依賴於物理的生態危機，或是解讀此一危機的科學，更不在於奉為圭臬卻不能稍加質疑的自然價值。社會中生態多重意義的取得，必須首先從系統／「環境」的區隔中，<sup>(2)</sup>觀察那些系統中的意義關聯。在盧曼看來，社會世界是透過系統／「環境」的二元性來化約其複雜性（Luhmann, 1995: 182），以獲取自我認同與事件意義，系統／「環境」間的區隔並不在形上學或物理之差異，而是基於功能差異，不同的次系統於是造就出不同的「環境」概念，但是沒有「環境」就沒有可資區別的系統。基於不同功能，各次級系統將形成獨特的意義關聯，盧曼在《生態溝通》一書以「共鳴」現象（resonance）來加以描繪（Luhmann, 1989: 15）。所以，就社會系統而言，不是個人，或是物理環境成為系統的基本單元，而是溝通（Luhmann, 1995: 40; Nassehi & Kneer, 1998: 48）。在特定溝通系統中，經由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ity），人、事、物的關聯有了特定意義，透過這些意義的自我再製（autopoiesis），系統便獲得存續。在一般生活世界中，

---

<sup>(2)</sup> 這裡所指「環境」不是物理的生態環境，而是盧曼系統理論中的環境概念，本節以括號「」表示盧曼系統理論中，相對於系統的「環境」概念。

藉由這些無數多且相互交疊的意義系統，使我們的認同有了內涵，但也因此同一符碼也會有多樣的意義。不僅如此，這個多樣性差異也是源於事件系絡與時間流變，社會的意義系統因此總是變動而具暫時性 (temporalisation)。

以上盧曼的系統理論提供了一個對當前多元生態理解的有用詮釋，同時也暗示，環境問題之解決不待外求，應該觀察生態議題在不同次系統中的形成、再製、與一致化機制。這種從社會內在溝通去理解外在生態的途徑，與傳統甚至貝克的生態觀點均大異其趣。生態科學所描繪均衡、協調的自然生態系統失去意義 (Luhmann, 1989: 6)。每一特定生態環境只有參照其相對應的系統，才能確定其內涵，環境一詞的指涉因此是多元的 (Luhmann, 1989: 135)。環境一詞因此也代表著物理自然與文化成分的統合，傳統有關社會／環境的界線在此遭到消解，系統存續法則 (編碼) 成為界定環境的判準。可以說，盧曼徹底捨棄了一般所指謂的自然概念，開啓後現代生態觀的新視野。如此看來，自然本身根本不存在統一的道德意涵，人類／自然互動所衍生的生態問題必須在特定歷史脈絡下的特定社會中去理解，泛稱的、單一的自然是系統「環境」的一部分，且無關系統存續 (Luhmann, 1995: 181)。即便是被生態學者所診斷出的生態破壞與環境惡化也只有對特定的次系統才有意義，而且只有對系統自我再製造成威脅、扭曲，該環境問題對系統才構成問題，環境問題因此是社會問題，是意義與認同問題 (Luhmann, 1989: 28)。貝克那裡，社會／自然二元論是以人造自然來消解，但風險的客觀性依舊存在，而盧曼系統理論則進一步指稱，生態威脅既然是意義與認同問題，環境問題因此也無所謂客觀事實 (Luhmann, 1989: 28-29)，生態威脅乃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既然，社會次級系統係基於功能差異而形成，那麼特有情境下的生態溝通與意義就無法順利在不同次系統中以相同的方式被編碼與接納，如此一來，社會的多元生態詮釋雖獲得說明，但盧曼對於全社會的生態回應就抱持較悲觀的立場 (Luhmann, 1989: 27, 43)。問題是，在現實社會中，生態運動的主流意識究竟是如何構成的呢？在《生態溝通》一書中，盧曼沒有進一步說明，然依據其系統理論及相關著作，他顯然接受生態溝通可被視為一個功能系統，它以政治抗爭的形式發揮著維護社會運作的「抗體」功能，使社會系統以不同的路徑去調適環境，獲得免疫，但這是基於生態溝通本身的系統存續，不是由於反思現代化的高階知識導引，社會的環境回應也無所謂更好，只是會有不同 (Luhmann, 1993: 143)。不過，生態溝通的訴求對象終究指向全社會，儘管各種次系統對於什麼是生態危機可以有不同解讀，但是無論是企圖傳送訊息、獲取理解，或只是形成刺激，甚至淪為噪音，只要是以全社會為對象，生態溝通系統就不得不借助諸如自然、危機、生態、永續等全社會符碼，以超越其自身系統意義的侷限，掩蔽其次系統的地位，並宣稱其絕對效力，這樣效力當然不涉及先驗實在，事實上其結果如何生態溝通本身也無法確知 (Luhmann, 1989: 23)。生態溝通這種在系統內部去想像全社會的運作，其實會面臨一種內外統一的矛盾，亦即，既要排除環境，又要涵括環境的窘境 (Luhmann, 1989: 113)。只是，系統的自我指涉將不會自我揭露這一矛盾，任何來自其他系統的揭露也不能消解其效力，只能顯示其偶然性，因為意義的效力是封閉於系統符碼之中的。生態溝通如果只是一組符碼，就不可能產生具體合理的解決方案，但現實上，它是偶然性地藉助於不同情況的民主協商、科學建構、宗教信仰等來充填其內涵，而其規範效力則可以藉由「焦慮」(angst)來創造共識與特



定決策的合理性 (Luhmann, 1989: 127)。焦慮雖非以理性為基礎，卻轉化為觸發行動合法性的生態倫理。

持盧曼的生態溝通觀點驗證現實環境政治，我們看到多樣、衝突卻又並存的生態解讀與解決方案。在眾多生態理論中，盧曼的生態溝通詮釋可謂另闢蹊徑，對當前生態論述與實踐提供極具包容性的詮釋，徹底擺脫對於環境倫理的訴求，提出有關環境之社會建構理論。但也基於相同原因，盧曼的生態詮釋遭到諸如不具批判性、滿足主流意識、為現狀辯護、不道德、反生態、過度悲觀的種種批判與嘲諷。必須說明的是，這樣的批判往往是基於傳統生態主義觀點而發，也就是說，只有那些以傳統的生態烏托邦衡量盧曼理論的人，才會認為盧曼的生態詮釋是反生態與悲觀的 (Blühdorn, 2000: 178)。

#### 四、普魯東的後生態主義

隨著環境運動的成熟與擴張，自上世紀八零年代起，學界也發出對於當前生態理論與環境運動合理性的反思，普魯東以《後生態主義政治》一書 (2000)，企圖爬梳當代生態理論的演進，並與當前生態論述與環境實踐對話，本文對於後生態主義的理論評介即以該書為本。當然，在這一波反思風潮中，普魯東不是唯一、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但他在本書中，除了不滿傳統生態理論訴諸環境倫理，以致對生態政治的描述顯得灰白無力，導致環境運動實踐的挫敗，更引人注意的是他直接批判生態論述中最具說服力、以現代主義為基礎的理論建構，從而主張徹底棄絕現代主義式的「自然」概念，並以盧曼的生態溝通為基礎，尋求後生態主義可能的實踐意義與場域。

那麼普魯東所指後生態主義的內涵又是什麼呢？後生態主義的核心概念就是「捐棄自然」。自然在傳統生態主義或是環境運動中，總是意涵著單一性，也就是只有一個自然、一個全球生態均衡、一個人類生存利益、一個自然的價值、一個統一的人類理性，並認為這樣一種單一性終將說服人們接受理性行動，進而去尊重自然，營造具生態關照的社會 (Blühdom, 2000: 36)。不管生態主義者如何談多元與民主，這種單一性思考恰好反映了迄今生態思想的基本原則，這正是現代主義思考的核心，單一與多元之間因此劃下了傳統與後生態主義的巨大差別。事實上，現實社會中的自然概念都是重構過的自然，單一自然早已被捐棄，生態浩劫只是一種意識所認同的浩劫，只是我們都無法自知，因此所謂捐棄自然指的是一種知性的轉換而不是否定物理事實。瞭解這一點，方能理解何以當前社會中的生態詮釋與決策可以如此多元與矛盾，甚至以自利及貿易為基礎的國際建制規範，竟已可以成為環境規範的運作法則，影響所及，自然生態也成為商業宣傳的工具，這對於傳統生態主義的倡議者而言，毋寧是一種諷刺。

前節已揭示，批判理論的人工化第二自然，貝克的社會化自然，都已掌握到捐棄自然的概念，可惜貝克無法徹底放棄客體環境條件，此所以普魯東認為，透過盧曼的系統理論，生態詮釋得以藉由無限多個社會／自然二元性，超越單一社會／自然的關係，從而完整地詮釋生態政治現實的多元、偶然、與複雜性 (Blühdom, 2000: 152-154)。同時從盧曼的系統理論看，個人角色為系統所決定，這不僅與批判理論將主體無限上綱不同，同時也顛覆了傳統生態理論或風險社會理論中所努力嘗試建立的各種理性、烏托邦以及有效動機等必要性。個人退位的觀察，藉由放棄現代主義中啓蒙人文主義思考，從而根本性地揭穿了資本社會看似

個人一再被強調，卻不過是在塑造消費者自我（ego），掩飾個體退位的事實。這樣看來，生態終極倫理也無從建立，這不僅因為它失去號召對象（個體），更是因為不可能存在一個適用全社會、跨越所有次系統的道德符碼，生態倫理只有多元定義的生態倫理（Blühdorn, 2000: 83）。既然如此，環境問題就不是由物理條件所決定，而是由個別的文化道德規範所詮釋，貝克雖也強調這一點，卻無能指出這個文化規範的內涵，而盧曼的第二層次觀察卻為我們指出那正是現代主義本身，當我們可以從另類的系統角度觀察時，可以發現對於生態與現代性的反思仍然是現代性思考的產物，因此種種扭曲與制壓是不可避免的。

究竟普魯東所倡議後生態主義的優越性在那裡呢？會不會後生態主義也印證了一般對盧曼理論有關不具批判性、維護現狀、反生態的批評呢？後生態主義理論並不滿足於盧曼的系統解釋，而是以盧曼所提供的檢視途徑，企圖揭穿那些建立在理想的、他者的生態想像，從而直觀那個發自人類自我、認同建構的生態論述。普魯東強調，後生態主義的知性超越，可以使當代社會不再受到現代性主體與總體性概念的禁制，得以從嶄新視角形塑與解決環境問題，從而聚焦在個別理性形成及特殊利益運作（Blühdorn, 2000: 159）。後生態主義以更適切的方式觀察那個號稱以自然為基礎的生存選擇，反而可以發掘後生態政治中的不平等分配與社會排斥，放棄尋求對全社會共識的想望與錯覺，更能使觀察者專注於「環境論述」是在那裡、如何、何時被框架出來，而這無疑是種對生態政治的觀察。在捐棄單一自然的宣稱之後，第一層次觀察可發現多元生態溝通間的差異，第二層次觀察則可以發掘生態政治中所可能衍生的不義與排斥。



## 五、結 論

本文就傳統生態主義之外，評介三個重要且相互關聯的生態思潮發展，這三個理論詮釋雖然各有其不同的強調面向與概念經營，但與傳統生態主義觀不同的是，他們均企圖擺脫環境倫理的光環，並分別提出當代生態問題的解析架構。一直以來傳統生態主義者主張社會應朝「生態為中心」的世界觀轉向，正好相反，無論是貝克、盧曼與普魯東，均強調「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生態觀察。一旦生態與環境被視為是人與社會的副產品，也就等於宣判了激進生態主義的破產，因為自然正是傳統生態主義者不可質疑的核心思維與最高價值。

今天，在多元環境解讀與解決方案爭相競合的同時，仍舊可以聽到、看到各式以自然價值為訴求的宣傳與說帖。顯然，後生態政治已運作多時，但傳統生態主義的基調仍吸引著許多人，盧曼也已然觀察到這樣的現象，而將之稱為「非同時的同時性」(simultaneity of non-simultaneity) (Luhmann, 1989: 4)。於是我們似乎可以肯定，生態主義並未終結，但需要轉型，隨著環境議題深入跨國決策以迄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調整我們生態認知必要性就愈加急迫：我們不僅需要關懷環境問題的解決，也應時刻注意環境問題的形成及其合理化過程，關注各種生態言說背後的論述動機、自然界定、利益考量以及權力運作，從而揭露制度扭曲的可能，探究環境正義的實踐情形。



## 參考文獻

- Nassehi, A. & G. Kneer, 魯貴顯譯 (1998)。《盧曼社會系統理論導引》。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Mark Ritter, Trans.). London: Sage.
- Beck, U. (1995) Ecological politics in an age of risk (Amos Weisz, Trans.). Cambridge: Polity.
- Blühdorn, I. (2000) Post-ecologist politics: Social theory and the abdication of the ecologist paradig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Horkheimer, M., & Adorno, T. (1972)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John Cumming, Trans.).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 Luhmann, N. (1989)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Jr. John Bednarz, Tran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Luhmann, N. (1993)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Rhods Barrett, Trans.).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Luhmann, N. (1995) Social systems (Jr. John Bednarz & Dirk Baecker, Tra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e End of Ecologicalism or Eco-movement in Transformation? Review on U. Beck, N. Luhmann, and I. Blühdorn

Shih-Jung Chen,\* Zheng-Ru Zhong, U-Ming Su,  
Han-Chung Chang\*\*

### Abstract

Today the connotation of “nature” undergoes a radical change. Environmentalist narrative with traditional idealist mentality, such as “finiteness of resources” and “natural restoration”, are still diffused and applied, whereas a much optimistic, economic-oriented terms like “green golden era,” “green technology,” “green entrepreneur” rapidly proliferate. Such transformation seems to suggest that in the fact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for individuals and states, attentions are more likely concentrated on the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energy, industries, economy, texts, and technology. In this way, ecological morality and social/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at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prized become remote and vaguer, and certain contradictions are even found within the idealist narratives. Does ecologicalism come to its end? How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define themselves? By reviewing master writings of Ulrich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Postgraduate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Beck, Niklas Luhmann, Ingoefur Blühdor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technology and ecology so as to illuminate th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responses to the multiple implications of nature.

**Keywords:** ecologicalism, post-ecologicalism, Beck, Luhmann, Blühdorn

